

文化不是任性

价值观、多样性与中国经验

单世联
著

Culture



Arbitrary

Value, Diversity and Chinese Experienc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文化不是任性

价值观、多样性与中国经验

单世联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不是任性：价值观、多样性与中国经验 / 单世联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10
(新人文丛书)

ISBN 978-7-5133-1833-4

I. ①文… II. ①单… III. ①文化研究—文集 IV. ①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5820号

文化不是任性：价值观、多样性与中国经验

单世联 著

策 划：陈 卓

责任编辑：周 凯

特约编辑：张 星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周伟伟

版式设计：刘 畅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60mm×970mm 1/16

印 张：25.25

字 数：346千字

版 次：2015年10月第一版 201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833-4

定 价：5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新人文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晓纯	吴晚云
副主编	罗学科	史仲文（执行）
	张加才	郭 涛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建嵘	马立诚	王向远	王清淮	王鲁湘
刘丽华	安乐哲	尤西林	吴 思	吴祚来
张 柠	汪民安	李雪涛	陈晓明	邵 建
赵 强	单 纯	金惠敏	骆 爽	夏可君
黑 马	熊培云	敬文东	谢 泳	戴隆斌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革	王鸿博	王景中	王德岩	曲 辉
刘永祥	孙德辉	李志强	邹建成	张卫平
张 轶	张常年	周 洪	屈铁军	赵玉琦
赵晓辉	赵姝明	袁本文	铁 军	秦志勇

【总序】

新人文：在思想与行动之间

王晓纯

“人文”一词，用法不一：古人将之与“天文”对举，今人把它与“科学”并列；它还常用来概称一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的崇扬人性与人道的主义或精神。

“人文”与“天文”对举，最早出现于《周易》。《周易·贲卦》彖辞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根据后人的解释，“文者，象也”，即呈露的形象、现象。于人而言，包括人世间的事态、状况，并可以引申到个人气象与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强调“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总是与人文密不可分。人而文之，方谓之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人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礼乐教化、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而文明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自觉和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

“人文”与“科学”并列，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关。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勃兴和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通过科学与工业革命不断推波助澜，甚至形成了科学与人

文之间所谓“两种文化”的分裂。

“人文”作为一种精神或主义，泛指从古到今东西方都出现过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的一般主张。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新人文是一种新愿景。现代社会使人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面前常感无力，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幸福之间往往容易失衡。新人文将目光聚焦于人本身，重塑价值理性，高扬人性尊严，唤起内心力量，促进个性自由发展，让梦想不再贫乏，让精神充满希望。

新人文是一种方法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分隔也有渐行渐远之势。新人文试图重新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通，增进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互用，让科学更加昌明，让人文之光更加夺目。

新人文是一种行动哲学。继往圣、开来学不是思想者的唯一目标，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架设坚实的桥梁。新人文力图夯实人文基础，作为社会的良知而发出公正的呼声，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让思想冲破桎梏，用行动构筑未来。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编辑了这套“新人文”丛书，奉献给关心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人文建设的广大读者。

自序：洛水片思

五月的中原，鲜花满眼，我在洛河边的巩义市参观访问。两天的所见所思，恰好与本书所欲表达的主题非常接近。故将我在巩义会议上的发言略做整理，为本书诸文做一概括。

巩义市的文化遗产，以康百万庄园、刘镇华庄园和杜甫故里最为重要且知名。三者又分别与财富、权力、文化紧密相关，其中隐含着“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化”的问题。

“康百万”是明清以来对当地巨商康应魁家族的统称，康百万庄园是集家居、生产、经营于一体的大型传统庄园。在四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康氏家族前后十二代人在康百万庄园生活。康家发迹于贩盐业，其顶峰阶段是清中叶的康应魁。此人目光敏锐，在清廷镇压白莲教之时，主动服务于官府，取得所有与布匹有关的军需品订单，靠“尽忠发财”长达十年。在鼎盛时期，康家亦农、亦商、亦官，富甲豫、陕、晋三省，被称为“活财神”。正如古代中国所有的巨富之家一样，康家的富贵尽显于康百万庄园。它背依邙山，面对洛水，靠山筑窑洞，临街建楼房，濒河设码头，据险垒寨墙。“康百万”造就了一处真正的文化遗产，其整体结构所洋溢的壮观气势，其住宅区所蕴含的等级制度，其栈房区所体现的精细管理，其作坊区所反映的多样产业，其院内的牌坊、雕刻、园林、书画、楹联等传统艺术，均达到了中国民间工艺文化的极致，因此被誉为“豫商精神家园，中原古建典范”。

与康百万庄园所显示的财富不同，刘镇华庄园则是权力的衍生物。

生于1883年的刘镇华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以“镇嵩军”为实力支持，官至陕西督军兼省长、安徽省主席等。1949年到台湾，七年后在台北去世。刘镇华的“英雄期”是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前，这期间，他东征西讨，一心扩充地盘，为害豫陕两地，“刘镇华祸陕”（1918—1926）早已载入史册。陈忠实的《白鹿原》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一队士兵开进白鹿原，他们一人背一支黑不溜秋的长枪，黑鞋黑裤黑褂黑制服，小腿上打着白色裹缠布的‘白腿乌鸦兵’，这些一口河南话、自称是‘镇嵩军’的士兵要所有的人都听从他们刘军长的命令，从此白鹿原再也不得安宁了。”这段话说的是1926年刘镇华率军七万攻打西安，与当时的守军杨虎城部队打了大半年，不允许城中居民逃难，以迫使守城军队投降，最终导致数万西安市民被活活饿死。在近代中国军阀中，刘镇华实力不强，也正因此，他能够周旋于各大军阀之间，并以翻云覆雨、没有政治操守著称，先后投靠过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等人，最后归附蒋介石。作为陕西军政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他凭借其权力在巩义修建了一座大型庄园。刘镇华庄园依山而建，坐北朝南，前为花园，后为主宅，上下三层，六个院落，总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整体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因其规模宏大且保存完好而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刘镇华是一个清官、一个爱民如子的将军，那么他必然不会有如此浩大的庄园。实际上，各个时代留下来的官员府第，基本上都是民脂民膏的结晶。当我们欣赏甚至惊叹于这些“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的宏伟建筑，领略“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的设计艺术时，应该想到这一切的背后，是无数的血泪和苦难。

因此，看过品味不俗的康百万庄园和宏大开朗的刘镇华庄园，再走进杜甫故里，我们只能为文人感到悲哀了。诗人的故里已无当年的遗留，除了传说中诗人出生的一孔寒窑外，其余所有建筑皆为市政府在2007年投资1.5亿元新建。让我感叹的是：富商巨贾留下了至今仍气势逼人的庄园，纵横多年的军阀亦有确具文物价值的故居，伟大的诗人除了诗作外却别无所留。虽说杜甫的名篇佳作至今仍在哺育着中国人，但要到巩义旅游，游人更想去看恐怕多是这两个庄园而不是杜甫故里。

要说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康百万、刘督军都不能和杜诗圣相比。当然这是站在文人的立场上讲的。对今人来说，康百万庄园的文化不只表现在它的建筑、园林、雕刻和楹联方面，更在于康家所体现的明清中国的商人伦理。从康家庄园中可以看出康家至少在理论上是秉持诚信、勤俭、中庸等儒家伦理和处世原则的。在其院落中随处可见“知所止”、“旷世怀”、“敬直义方”、“船行六河须防不世风浪，耜耕三省当思创业维艰”等语句。如此认真地把这些教训写在家中、刻在房上，可见康家的成功有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士人如何运用他们从儒家教育中所得来的知识以治理国家，商人便会运用同样的知识来经营他们的商业。”^①宋代以降，中国富商巨贾多如过江之鲫，但大多“富不过三代”，康家能延续400多年，其族人必然有着过人的智慧和严格的训教。

最值得注意的是，康家的繁荣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也就是说，这个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现代转折。其背后反映的是明清商人的崛起，这一崛起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余英时的研究表明，从朱熹到王阳明的三百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 and 价值系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基本特征是商人阶层的崛起，形成了一个具有近代性格的“早期现代”。在此期间，儒家和商人都在重估商人阶层的价值。儒家伦理重视个人道德的物质基础，不再毫无区分地对商人抱以轻视态度。“治生”如果不比“读书”更重要的话，至少也与之并列，皆为儒者所学之事。迅速崛起的商人群体则逐步确立了一个相对“自足”的世界观，以“良贾何负閎儒”、“贾何后于士哉”的自信来表现其存在，且向社会、政治、文化方面扩张，取代了一部分此前属于“士大夫”的功能。弃儒就贾，士商合流，蔚成风气，以至于士商界限日益模糊，商人不但在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序列中晋身“老二”，甚至还有超过“士”的气势。

至于刘镇华，在文化上也可以对其有另一种评价。像许多旧军阀一样，刘镇华也有尊师重教、造福桑梓的一面。在陕西，他大力支持创办西北大学，前来讲学的鲁迅等人受到他的热情款待。在家乡，他也做过不少

^①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2页。

善事。据说，刘镇华每次回家都老远就下车，步行而归。其五弟刘茂恩是在刘镇华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在追随刘镇华多年后，率部参加过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等，以身许国，有功于民族。

我们不能在狭隘的民粹主义立场上评论康百万庄园和刘镇华庄园，它们都是文化遗产，有着超越其修建动机和实用功能的文化价值。但我们仍然应当看到，在财富、权力创造的文化之外，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世界。而这个世界，却一直没有得到财富和权力的切实支持。以杜甫为例，其一生尽可以用穷困寂寥来形容。“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艰难困苦、颠沛流离的一生虽然造就了杜甫悲悯博爱的人道精神和沉郁顿挫的卓越诗风，但一代诗圣如此受苦受难，世道和人心也真是过于残酷了。宋人欧阳修有云：“……生焉一身穷，死也万世珍。言苟可垂后，士无羞贱贫。”（《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那么，在杜甫之后，人们是否就不再“羞贱贫”了呢？

康百万、刘镇华都已成为历史，但由其庄园而生的联想却并非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近十多年来在发展文化产业、开发地方遗产的潮流中，各地都把家底翻了出来，似乎曾经有过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值得开发和重建的。一个并非隐晦的现象是，以秦始皇为标志的官场文化和权力崇拜和以西门庆为代表的腐朽文化和奢侈作派，在当代文化生活中愈发凸显，文化建设受到权力和财富非常严重的挤压甚至污染。比如，以权力为中心的管控方式仍顽强存在，政府强有力地主导着文化的各个领域，把发展文化当作时髦。只问政绩，不问需求；只重生产，忽视消费。“一言堂”仍决定着一个文化项目、一件文化产品的命运。再如，把文化当作经济的附庸，不尊重文化生产的特殊规律，只重视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而忽视其社会效益，同时忽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这些现象表明，文化产业的独立性至今仍未树立。这就使得一部分文化人在面对权力和财富时缺乏坦荡心理，周旋于权贵之间，竞走于富豪之门，一方面不择手段地争取项目资格、谋求项目经费，另一方面却欣然地以“建构型知识分子”自居。难道这就是文化人应有的精神状态？

中国社会仍在演变之中，康百万庄园、刘镇华庄园是需要被珍视的文物，杜甫的诗也同样需要被更多的人所喜爱。在此多元的文化景观中，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我们的文化如何才能不是权力的仆从和金钱的玩偶。权力，即使是关进笼子里的权力，也免不了它的张狂和强暴；金钱，即使是参与文化建设的金钱，也免不了它的放肆和计较。当权力和金钱任性、自恋、暴虐之时，我们需要信念、道德、审美来抵抗和平衡。并非圈一块地、建几幢楼就是文化园区，并非花巨资、找名星就能拍出好电影。文化是价值而不是工具，创意是生活而不是商品。文化表达自我又塑造自我，文化是自由也是对自由的约束。总之，文化不是任性，应有其规范、价值和标准。当代文化中太多的任性之举，并不表明我们的文化是多么的自由和活跃，而是说明文化的一部分还处于权力和金钱的控制之下。改变这一现象、走出这一阶段，不是文化自身的事情，也不是在文化领域内能完全解决的。中国文化能否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和财富能否为文化所用，而不是文化为权力和财富所用。如果说政府领导是公仆、经济发展应以人为本等理念已经得到普遍确认的话，那么，日益文明化的中国公民，决不会容忍权力和金钱的任性而为。

根据2015年5月21日在“巩义市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整理而成

目录

自序：洛水片思	001
---------------	-----

上编 文化多样性

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	003
论“文化多样性”的中国话语	031
偏执“独特性”的一个教训	059
“人文精神”的两种形态及其中国论述	067
“形左实右”的“1960年代”？	084
艺术“后”转的前前后后	096
“软实力”论述中的流行文化 ——兼论“软实力”的中国话语	108
“软实力”论述中的地方文化：以广东为例	134
粤港文化交往的历史与启示	155

下编 中国经验

红楼故事中的价值取向	171
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以明代海外经贸为例	186
贺麟与哲人爱国	201
贺麟论哲学与政治	222
贺麟文化身份再认识	242
民国人物的新与旧	261
评胡适的民主论	279
个性与命运：以沙飞为例	320
何炳棣的“战斗”	330
思想解放之后的三种选择	344

后记 结旧与开新	384
----------------	-----

上编 | 文化多样性

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 (cultural diversity) 是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和恒久特征。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在它与其他文化相区别时才能被辨识,也才能有现实的存在。一方面,相应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文化的起源和演化不可能是同一的;另一方面,人类需求结构的差异性和欲望理想的丰富性,也只能由文化的多样性来表达和满足。我们有无数的视角和理由论证文化的多样性,以至于经济学家玛格林 (Stephen Marglin) 断言:“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①然而,在全球化时代,这个似乎自明的问题变得隐晦起来了。新生还是消逝,多样性面临抉择。

产业化加速全球文化趋同

无论在事实认定和价值评判上有多少分歧,全球化作为当代经验的一部分已是无可辩驳的存在。这首先是对经济活动的描述,运用高新技术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无国界的自由贸易等正在把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市场。这又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以市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民主政治为主导的现代制度,以自由、人权和公正为主导的现代价值

^① 《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

观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在不断增长的国际间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之流日趋强劲的调和下，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日益成为一个联系更为紧密、差异更为缩小的整体。在历史地理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特殊文化（民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和社群的）以当代传媒技术为支持，借助不断扩张的资本运作，在全球规模上持续、深入地交流与互动，越来越呈现出整体性发展的趋势。相似性在增加，色彩鲜明的差异在减小，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越来越有超越本土化的趋势。美国学者彼得·伯杰（Peter L. Berger）概括了文化全球化的四种载体：一是被称为“达沃斯文化”的国际商业精英群体；二是被称为“学院俱乐部文化”的国际知识精英群体；三是“麦当劳世界文化”；四是“福音派新教”或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通常指宗教性群众活动。所谓全球化就是文化性的物质及观念借助这四种载体从西方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运动。^①在抽象的意义上，文化全球化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价值和全球伦理开始具有现实存在的品格，最终趋向全球文化共同体。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种因素和力量都将在其中发挥作用。就目前阶段而言，它首先由于文化产业化而获得动力。

文化产业具有跨越文明界限和制度藩篱的特性与功能

作为“整体性的生存方式”，文化是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尽管文化交流自古普遍存在，但在产业化之前，一方面文化作为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审美观念和价值信仰，难以大规模地在域外传播扩散，另一方面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跨国交流实际上受制于政治关系，国家对峙蕴含着文化对抗。产业化意味着文化的商品化，商品化导致交换价值的统治，并使理性计算在文化领域成为可能。所有的文化差异、文化传统等质的问题，都

^①彼得·伯杰：《全球化面面观》，塞缪尔·亨廷顿主编：《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